

劉子全書卷之三

# 刘宗周评传

門人董

瑒編

語類三 孔孟合璧 五子連珠

附聖學典

東方朔 著

劉子全書卷之七

山陰後學李宏信校刊

是歲丙寅寓韓山莊客有問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匡亞明 主編

夫乃者友人偶窺及亟有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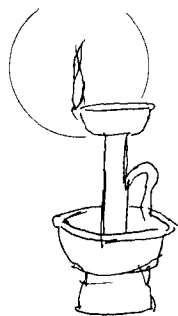
宜出以示學人予謝不敏乃復

日五子連珠蓋取漢麻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

三關竝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手抄之下輒欲請致



南京大學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 刘宗周评传

东方朔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宗周评传/东方朔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2(2002.4重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7-305-03191-7

I. 刘... II. 东... III. 刘宗周(1578~1645)—  
评传 IV. 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920 号

##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 刘宗周评传

东方朔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刷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照排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07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500

ISBN 7-305-03191-7/B·190

---

定价:23.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王 湛 陈万年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①</sup>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sup>①</sup>，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②</sup>，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

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

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方面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人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

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厘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 内容简介

刘宗周是明末的一位著名的儒学大师。

明代中叶以后，以阳明为统领的心学弊陋日显，以至流为空虚，宗周生逢其时，对王学末流之诟病勉力匡挽，思以补偏救弊，其学说远承近接，提清诚意，归约慎独，由阳明会通程朱，并反溯《大学》、《中庸》，而独出义理规模。应当说，王学末流之病，经由宗周的一番着力扭转，学风逐渐趋于健实和客观。

宗周一生，主要是学者的一生，虽然他很早就走上了仕途，但他一生实立朝者却只有四年半，其余大部分时间勤于著述。宗周思想推本于濂溪及程朱，而与程朱又皆有齟齬；得源于阳明，而为说又另立系统；受教于许孚远，而其学非许氏所能范围；切磋于高景逸、陶奭龄，而其思想迥非高、陶所能和同。人们认为，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此说当不为过。

本书系统地描绘和评述了宗周一生的思想发展，尤其对宗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宗周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了细致的考察，并对宗周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刻的说明，力图呈现出宗周思想的整体面貌与基本性格，并藉此展示出儒家心性学说的规模与特点。

## **A Brief Introduction**

Liu Zhong-zhou is a famous Confucianis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u Zhong-zhou lived mainly a scholar life. Liu Zhong-zhou's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Zhou Lian-xi, Cheng Yu and Zhu xi, but was different with Cheng's and Zhu's; Zhong-zhou's thought can be traced back to Yang-ming, but it did set up a new system as a theory; Zhong-zhou was ever taught by Xu Fu-yuan, but his doctrine surpassed Xu's greatly; Zhong-zhou ever consulted with Gao Jin-yi, Tao Shi-ling, but his thought was too far to be the same as Gao's and Tao's. It was appropriate that Liu Zhong-zhou was the las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Confucianist in Song and Ming periods.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and commented Zhong-zhou's thought development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especially analysed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ong-zhou's thought in deeply, examined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phases of Zhong-zhou's philosophy with meticulously, offered a profound account for the influence of Zhong-zhou's thought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With this the author tried to represent the whole appearance and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Zhong-zhou's thought, and also tried to show the scope and the feature of Confucian's theory of mind and human nature.

## 前 言

德国哲人 H·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人们只限于从原则方面声称文化价值在事实上获得普遍承认，而不以任何方式询问文化价值的有效性，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下面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作为历史学家则认为或许是可能的)：历史科学的基础将来又会消失，就像它的形成那样。这样一来，就使那种区别本质和非本质成分的历史叙述具有一种性质，这种性质使人们觉得把这种叙述称为‘真理’似乎是值得怀疑的。”<sup>①</sup>对一种文化价值的承认是否仅诉诸于原则方面的认可看来是会有问题的，只不过即便对某一文化价值的有效性的追问，其间也并不完全否认原则的“声称”。然而，任何原则的声称必定有其历史叙述的基础，问题既不在于对“科学的”历史方法采取某种机械的教条式的应用，也不在于用一种廉价的怀疑主义的立场来对待对历史的严密的思考。时至今日，兰克(Leopold von Ranke)式的对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完全真实”的追求和愿望已多少具有往日神话般的色彩，至少在方法上这种观念已被其后继者如狄尔泰(Wilhelm

---

<sup>①</sup> 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21 页。

Dilthey)、西美尔(Georg Simmel)等人的批判历史观所代替。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不再、亦不可能是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复原和翻版,不论我们的学问有多么博大,也不论我们考订原始资料的手段有多么科学,人们毕竟在怀疑那种追求纯粹客观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或许是尼采为何会提出“纪念碑式的历史”(monumentalische geschichte)这个概念的缘由,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走得更远,干脆喊出了为“偏见”作历史辩护的口号,在这一口号声中,我们才真正严肃地,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参与着历史的重建。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形象地表达了此间的义理: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然而,话虽这么说,这种由对历史事件的解释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被正确地了解的话,必定是以尽可能的客观和公正作为其底子的,人物、思想、思想的源流以及特定的社会存在状况之间所固有因果关系总是构成对某一历史事件作出阐释的可靠基础,这里需要动人的博学,却并不需要薄古的傲慢和怀旧的伤感。雅斯贝尔斯说:“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探究的使命,实在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感。”<sup>①</sup> 藉此责任感,我们才能把深藏在眉宇间的智慧恰当地展示出来。

当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思想家的思想作出妥贴的描述和品评,除了要注重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对思想家的制约和影响之外,恰如其分地注意到属于思想家个人的因素对其思

<sup>①</sup>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想性格和形态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对于一部评传性的作品更是如此。狄尔泰、文德尔班(W. Windelband)等人都曾强调了这一点,在思想史中,那些属于个人的个性的创造物,同样地具有体系性的意义。至于流行于当代西方的解释学(Hermeneutics)则更是把历史真理的内容看作是人的生活自身,把解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来加以推崇。他们反对把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同研究某种物体一样完全等同起来,将动机、意义、个性、角色承担等等从思想家的行为和生活中剥离出来,先于生活去理解思想,使思想仅仅成为僵硬干枯的因果关系,而失去了其情性兼备、色彩生动的内容。无疑的,来自思想源流的影响限制着对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对历史上思想家的研究始终当注重“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然而,迄今为止思想史的体貌之所以色彩缤纷,形态各异,其原因正在于任何观念的生成、发展,任何幽深曲折、光怪陆离的思辨体系的提出,都是通过个别人物的思考来实现和完成的,尽管这些“个别人物”的思想总是或深或浅、或迂回或直接地扎根于该历史时期的逻辑联系中,然而,他们却始终以其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殊异的生命、生活方式为其思想装红缀绿,浹洽其体,圆融其用,以致各呈风采。美国的中国思想史学者史华滋(Benjamin Schwartz)教授认为,思想史的重点之一,便在于考察人类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意识反应,但却不是一开始就用某种假设性的起因来解释他们的思想,人的有限度的自由是思想创造性的根源之一。<sup>①</sup>不过,相较之下,文德尔班说得更为清楚和明白,他认

<sup>①</sup> 参阅《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